



引用格式:刘旺旺.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及其对当代的启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21-28.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21-08

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and logic of Lenin's thought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party

刘旺旺

LIU Wangwang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执政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程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精神命脉、国家的灵魂气魄。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零散论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逻辑:文化落后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制约;文化重要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应然;文化反哺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列宁这种“文化落后—文化重要—文化反哺”的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启示: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

关键词:

列宁;
执政党;
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9-12-2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9SJA0216);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MLC005)

[作者简介]刘旺旺(1990—),男,河南省沁阳市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列宁文化思想。

文化作为人之血脉、国之命脉,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不仅是立国之本,更是立党之基。任何执政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积极引领,不可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也无法凝聚民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蕴含着“文化落后—文化重要—文化反哺”的逻辑。这一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启示意义。

一、落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制约

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相对于社会变迁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呈现出或超前、或滞后两种样态。马克思提出的“死人抓住活人”、邓小平提出的“小脚女人”,都旨在说明文化发展滞后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困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但落后的文化却给执政的俄共(布)(后改为“联共(布)”“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羁绊。

1. 普遍的“奥勃洛摩夫习气”

旧文化对俄共(布)执政效能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执政后列宁多次提及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它代表着小农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一种沉湎于幻想、因循守旧、懒散怠惰的人生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们因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域,共同的生活方式会使得其性格中存在某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列宁认为,俄国人在文化共同性上的表征之一就是典型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早在1902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就意识到了这种旧习气的停滞、闭塞、荒芜等弊端。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再一次提到了这种旧习,认为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部队,但它只是苏俄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又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而脱胎

于旧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在这样的国家可以先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但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这背后的制约因素就是俄国文化的落后,特别是“奥勃洛摩夫习气”的困扰。在列宁看来,苏俄有着大片的土地,甚至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但是这些地区“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是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在列宁看来,共产党员应该是国家最优秀、最先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应该具有较高的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但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列宁对“奥勃洛摩夫习气”依附对象的分析逐渐从农民转移到共产党员乃至国家机关各级领导人身上。1921年10月,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列宁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员身上缠绕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不要卖弄聪明,不要摆共产党员的架子,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落后。”^{[1]510}在1922年召开的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列宁多次提到共产党员身上存在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2]12}这时的列宁已经意识到,“奥勃洛摩夫习气”不仅存在于农民身上,在“具备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的共产党员身上也依旧存在。为此,他强调必须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毫不动摇地反对“奥勃洛摩夫习气”。

2. 缺乏管理本领和不会做经济工作

俄共(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承担的使命也由“夺取俄国”转到“管理俄国”。在执政初期,列宁在总体上对工人阶级、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持肯定态度,认为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的革命热情和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在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引导下,落后的俄国可以生机勃勃地建设社会主义。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经济成分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多,对俄共(布)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即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较高的管理本领,会做经济工作,但当时的多数共产党员却没有这种本领。1921年10月,列宁在有关报告中指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即资本家将同共产党员一起工作,这就产生了共产党员能否更好地为自己工作的问题。对此,列宁强调共产党员要尽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思考是他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先进与否对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献中对共产党员因文化落后而不会经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2]83}这里,列宁将共产党员是否会经营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员的文化落后。为此,他强调所有人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

3. 拖拉、贪污、官僚的腐败行为严重

俄共(布)执政初期,列宁认为革命已将旧国家机器彻底打碎,旧的工作作风也将随之销声匿迹,不会在新社会中出现。但在俄共(布)执政后不久,拖拉作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旧机关的坏作风沉渣泛起。究其原因,在他看来,一是因为新机关是从旧机关继承下来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旧机关的残余。在俄共(布)八大的文献中,他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把他们

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3]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他再次批评国家机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苏俄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377}。列宁的意思是说,俄国的政治革命将旧官僚制度和旧官僚清除了,但由于党自身的文化落后,不能很好地实行领导和管理,被迫启用了旧官僚,因此旧官僚“又从窗口飞进来”了。所以说,新国家机关只是在旧机关的基础上“稍微粉饰了一下”,本质上体现的还是旧机关的作风。二是由于人民群众甚至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法律观念淡薄,不能正确运用法律去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列宁对此有深刻的体悟,他说:“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1]207}在这里,列宁指出了俄国是一个民众普遍没有法律意识的国家,就连作为先锋队员的共产党员也没有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为了能够抵制地方由于受“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影响而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列宁提出:“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地实行法制。”^{[2]201}在他看来,如果不建立全联邦统一的法制,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文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法制和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因此,千方百计地清除党内权力崇拜、官僚主义等弊病,通过文化训练建立更高层次的法制和文明是列宁孜孜追求的一个目标。

综上所述,列宁对上述党内存在的病症进行了深刻的病理分析。在他思想深处,特别是在其晚年的最后思考中,直接切中了给执政党带来危险的要害——文化落后和文化贫困,并指出其根源在于文化血脉中流淌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具体表现为作为先锋队员的共产党员缺乏管理本领、不会做经济工作,以及拖拉作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

二、重要: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应然

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仅逐渐认识到文化落后给党有效执政带来的深层制约,而且从价值层面意识到文化建设对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落后”构成了有效执政的深层文化制约,那么“重要”则构成了科学执政的文化历史应然。即是说,执政党要执政、执好政,必须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

1. 提高文化水平是带领人民前进的要求

党的执政绩效归根到底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上,而欲想实现这一执政使命,增强执政本领、带领人民前进是执政党的不二选择。但从旧文化“娘胎”中生出来的俄共(布)在执政后,手中不乏有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唯独缺乏的是文化力量。在1918年俄共(布)领导苏俄尝试实施第一次工作重心转变时,列宁明确提出执政党要“学会工作”。他指出,随着全部权力的转移,党肩负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党的领导干部要相应地转变思维方式。1921年,列宁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避免“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等的空谈,要用实际行动来向人民证明党能带领他们前进,不然就连最普通的工人都要取笑执政党。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

任务之一。”^{[1]205-206}这里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任务的解决来消化政治变革,因为在政治变革初期,党只有对人民群众许下了承诺,人民才会跟着党一起前进。但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兑现承诺,那么人民就会说“滚你的吧!”“那就走开吧!”(列宁语)。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2]137}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针对“敌人”喋喋不休地指责俄共(布)在衰老,党的头脑和整个机体在丧失灵活性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在他看来,国际国内的形势逼迫着党必须率领人民前进,而党要承担起如此重任就必须获得文化。列宁上述的论述强调的是,执政后的共产党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带领人民前进,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2. 提高文化水平是治疗官僚主义的良药

俄共(布)通过急剧革命的方式取得了执政地位。在执政过程中,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执政初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体现为人民当家做主,彻底铲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并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1918年4月,俄共(布)第一次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列宁只是零星提及到官僚主义,并且认为只要苏维埃同人民相联系,采取多种多样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就能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到了1921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党对官僚主义认识的变化。他指出,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党的注意,党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又过了一年,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复活,并在党纲中直率地提出要同这种祸害作斗争;又过了两年,党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4]。他还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1]404}“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官僚主义显然已成为共产党身上的“脓疮”,列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为它进行了深度的病理分析。在他看来,这三者都是造成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但经济、政治属于显性的,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革政治制度来纠正,是比较好的“治疗方案”,而文化则是隐性的,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引导才能有所提高,但是文化是“治根的”。正如列宁所言:“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1]208}列宁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开出的“药方”可谓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只有作为先锋队的执政党文化水平和素质不断提高,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才能摆脱其对自身肌体的腐蚀。

3.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是改善国家机关的必需

列宁认为,苏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应有的文化素养,表现出“令人厌恶”“非常可悲”的情况。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摆在党面前的文化难题。他指出,我们的力量是什么,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都足够了,“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2]97}。同年10月,他又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各国有疯狂的竞争、千百万人失业,但同它们相比,苏俄必须不愉快地承认自身的文化水平低、

生产力不发达、工作本领差。对此,列宁强调要花大力气、切切实实地改善国家机关,而不是写几篇文章或者在文牍的汪洋大海中游荡。他说:“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2]252}1922年12月,列宁在有关讲话提纲中列出了苏俄国家机关的文化“糟透了”的情况。他写道:“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问题正在于整个文化,而提高文化需要好多年。”^{[2]329}在他看来,苏维埃的国家机关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从沙皇制度转变过来,对旧制度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进行认真的辨别,只是匆忙地接过来。鉴于此,列宁在考虑国家机关改革的措施中,突出强调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就指出,党和国家机关内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少得可笑,为此,“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384}。在这里,列宁强调国家机关的革新要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骨肉,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才能算作是已达到的成就。这里蕴含的深意就是:要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因为只有文化才是存在并支撑人之生命的“血肉”。

三、反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

列宁认识到俄共(布)执政所面临的文化制约并非意味着他陷入了“文化宿命论”的漩涡。在他看来,正确认识到文化制约给执政党带来的危险就是执政党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同时,他虽提出了“文化革命”“文化主义”等独特概念,但他并没有走入“文化万能论”的象牙塔,而是强调通过执政党的文化建设来反哺经济建设、政治变革,通过系统协调发展走向社会主义。

1. 文化建设与政治变革戚戚相关

十月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变革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胜利初期,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指出,革命不可能立即在世代都处于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千百万农民和工人身上培养出能够识字、有组织能力等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6]。后来,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红十月为最大规模的文化革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在已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正在实现文化革命,二者经常互为作用。”^[7]这里,列宁揭示了政治变革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变革为文化革命开辟了道路,文化革命要清偿政治变革欠下的“债务”。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2]372}在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家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俄国革命偏离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然会给国家文化带来灾难。而在列宁看来,他们根本不懂革命的辩证法,即政治变革与文化革命可以互为前提,在实现了政治变革后,要用文化建设来消化政治变革的成果,偿还其留下的“文化债”。

2. 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新型文明的诞生、成长、成熟无不与经济密切关联,都是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列宁在革命活动早期,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文化时,就已经注意到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在执政过程中,他也强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1920年2月,列宁在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化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等,应当同农民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衔接起来,这样就能使文化不脱离经济。列宁还指出,要尽快抛弃掉已过时和错误的文化建设方法,特别是党内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通过“实验室道路”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这种方法如同“孩童时期的幼稚病”,必须尽快根治。在列宁看来,文化工作只有“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就能使工人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增长百倍”^[8]。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贫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他说:“着手执行的任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调。”^{[2]67}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再次阐述了文化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广大农民由于没有文化,不能正确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为此,他强调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来促进合作社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2]368}。可以看出,列宁在其执政晚年更多地强调了文化对经济的反哺作用。

3. 文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列宁认为,开展文化革命的目标指向,是要俄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看来,文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化革命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就是空谈。1922年3月,列宁在有关信件中提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2]67}在《论合作社》中,列宁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

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在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2]372}这段话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文化革命是苏俄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二是文化革命不仅是指精神文化层面,还包括物质文化层面;三是文化革命与自身内涵的两个要素(文化要素、物质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物质基础的丰富有助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物质基础的丰富;四是完成这些任务对于执政的俄共(布)来说都是非常艰巨的。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建设、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而言,文化建设则更具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它的最终成效关系着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鉴于此,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革命来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反哺苏俄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指向是建成社会主义。

四、当代启示

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 以自觉为前提

自觉是有意识的主体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前提性认识,这种前提性认识是主体实现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前瞻性反思,即发挥“自知之明”的作用。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文化建设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毫不避讳地直言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存在着严重的旧习气,没有管理的本领,不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列宁指出,由于文化落后,致使党内拖拉作风、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这些思想启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自

身的文化状况有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指出,要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增强党的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关键在于党自身的建设,而要担负起党的伟大任务需要高素质的干部。因此,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9]45}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的“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表明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还存在文化水平跟不上时代变化的现象。他还说:“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10]这些论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状况存在不足的觉醒。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使党能够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2. 以自信为根基

自信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但有自信决不意味着成功,更不等于自傲和自负。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意识到了党所面临的文化制约,但这决不意味着他陷入了“文化宿命论”的漩涡。在他看来,认识到文化制约给执政党带来的危险恰恰是党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执政党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国家机关状况,更好地带领人民前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镜鉴意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就是要坚持“四个自信”。他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9]36}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并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其旨趣是要强调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党长期有效执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最有理由自信,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于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源于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 以自强为担当

自强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强调文化建设、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些思想启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勇于肩负起文化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任,为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做出文化上的贡献。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0]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知识。”^[11]这里的“依靠知识”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依靠文化,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339}。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化是力量、文化软实力关系“中国梦”的实现,都是在强调共产党人要有自强的担当精神,让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富完善发展增砖添瓦。

总之,文化是人独有的生命元素,没有文化

的浸润和滋养,人的本质就难以凸显。执政党建设更是如此,迫切需要文化的力量。从历史、时代、实践、执政的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可见,明确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文化思想逻辑。这一逻辑的时代背景虽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实践、执政等背景有别,但其思想精髓是一致的,即执政党必须对本国的文化要有“明确自觉、坚定自信、实现自强”的逻辑认知。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4.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8.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8.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9.
- [7] 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回忆列宁: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5.
- [8]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4.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0.
- [11]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02).